

五四志士的救国情怀

——记“五四”先驱周炳琳

五四运动时期,新青年周炳琳受孙中山、李大钊等前辈影响,满腔热血投身新文化运动和爱国学生运动,积极组织

创办《国民》

周炳琳1913年从浙江黄岩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16年升入北大法政经济系。起初,他表现出少年老成的样子,一心想把顺利完成学业作为将来做官的敲门砖。不久,蔡元培校长实行“兼容并包”办学方针,提倡“学术思想自由”,陈独秀被聘为文科学长,《新青年》随之迁入,北大的面貌焕然一新。受陈独秀、李大钊等启发和影响,周炳琳融入新文化运动的洪流,先期想做官的想法“去掉了一半”,迈向新的人生道路。

此时,北京的学生社团和刊物如雨后春笋般涌现。1918年10月,周炳琳和邓中夏、许德珩等同学,商议每人出5块大洋,凑了1500余元,在校外租了间大房子,发起成立《国民》杂志社,聘请李大钊为导师。召开成立大会时,蔡元培校长到会致辞,寄予厚望。1919年1月《国民》杂志创刊,周炳琳等轮流担任编辑

主任。《国民》杂志旨在唤起青年学生的爱国救亡意识。俄国十月革命的炮声,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周炳琳较早读过《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第一卷,但对布尔什维克主义认识比较模糊。当阅读到英文杂志《双周》的一篇文章时,他深感震撼,当即译为《鲍尔锡维克主义底研究》,发表在《国民》第2卷第1号上。该文讲到《共产党宣言》的发表、俄国的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列宁回国后的基本思想等,回答了“鲍尔锡维克主义和鲍尔锡维克派到底是怎样的”等问题。

创办社办期间,周炳琳广泛联络北京各校200多名社员,历练了组织动员能力。不久,周炳琳即与傅斯年等创办《新潮》杂志社成员一道,在五四运动中唱了主角。

街头演讲

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青年学生迫切要求走出书斋,开启民智。平民教育应运而生。1919年3月,周炳琳、许德珩、邓中夏等北大学生发起成立北京大学平民教育演讲团。该团以“增进平民知识、唤起平民之自觉心”为

宗旨,组织团员走上街头,开展大众化的演讲。周炳琳被推选为文牍干事,负责文稿的编印工作。

演讲团成立后,周炳琳等人经常组织北大同学分赴北京东西南北四城,面向群众,开展宣讲。他们通常事前拟好题目、选定地点,两三个人或三五个人一组,打着小白布团旗,携带一面铜锣,到人多而适当的地方,鸣锣开讲,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和语言,传播科学知识、爱国精神、新伦理观念和新中国政治思想。

周炳琳是演讲团的骨干成员。五四运动前后一段时间,他的演讲活动十分密集:1919年3月27日在护国寺演讲《什么是国家?》,启发民众的家国情怀;5月18日在北京四城演讲《山东与全国的关系》,唤醒部分民众对山东问题的冷漠。这些演讲饱含救国救民的情怀,迅速抓住了人心,不时得到群众的掌声和喝彩。

很快,街头演讲从城市扩展到农村。1920年3月,平民教育演讲团决定利用春假,深入卢沟桥、丰台、长辛店等处演讲。周炳琳等演讲团成员,总是把印好的演讲稿和通俗杂志分发给民众,即便经费拮据,时常遭到警察干涉,也没有放弃。不久,周炳琳先后参加少年中

国学会、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等政治性社团组织,成为其中的积极分子和活跃成员。

五四洗礼

1919年5月3日,周炳琳等同学从北大校长蔡元培那里得知,北洋政府密令巴黎和会代表在丧权辱国的《协约国和参战各国对德和约》上签字,这令他们愤慨万分。当晚,同学们即在北大第三院礼堂集会抗议,决定第二天联络各校举行集会和游行示威。

5月4日上午,周炳琳联络各校国民社社员,动员他们走上街头。下午4时,游行队伍到达北洋政府外交部,恰遇大门紧闭。墙不查,有的学生翻墙进去,开了大门,一群同学冲进去,直奔曹汝霖的卧室。躲在浴室里的曹汝霖听到外面的动静,吓得发抖,同学们缺乏搜身经验,让他躲了过去。只听传来一声“着火了”,躲在地下室锅炉房里的章宗祥吓得跳了出来,同学们根据事先看过的照片认出了他,群情激愤。

闻讯赶来的警察包围了曹宅,不少同学当场被捕。周炳琳等同学撤了出来。他态度沉着,加之身穿灰袍掩盖

了翻越曹宅围墙时所沾灰土,逃过追捕。

周炳琳等回校后,当晚召开紧急会议,讨论营救被捕学生办法。学生被捕的消息传开,第二天北京各校都罢课了。经过同学们和各方面交涉,北洋政府迫于压力,不得不释放32名被捕学生。5月7日,被捕北大学生回校,在广场受到全体师生热烈隆重的欢迎。

周炳琳等同学在五四运动中的突出表现,被爱国民族资本家穆藕初看在眼里。1920年,穆先生特向北京大学捐银5万两,作为选派学生赴欧美留学的奖学金。经蔡元培亲自组织选拔,周炳琳、段锡朋、罗家伦等5名“学术和道德兼全者”脱颖而出。这在当时被戏称为学生界的“五大臣出洋”。留学回国后,周炳琳曾一度在国民政府任职。新中国成立前夕,他断然拒绝蒋介石派来专机接他赴台的“美意”,选择留下来建设新中国。毛泽东在北京饭店设宴招待民主人士,在门厅与周炳琳亲切握手时,风趣地说:“你就是当年的‘五大臣’呀!”

(摘自《学习时报》文/韩勤英)

“他是把生的希望留给战友,而把死神留给自己的英雄。”这是人们怀念王传馥时常说的一句话。

1937年,王传馥参加革命,到八路军办事处学兵队学习,结业后到新四军工作。1939年3月,他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1月,他在皖南事变中不幸被敌人逮捕。他在狱中团结同志,坚持斗争,是中共茅家岭监狱秘密党支部负责人。1942年5月25日,王传馥组织狱中同志发动茅家岭暴动。为掩护同志安全越狱,他被敌人打伤,并再次被捕。1942年5月,王传馥惨遭敌人活埋,时年22岁。

下面这封信是王传馥于1937年12月奔赴延安前,写给父母的信。

信念永留天地间

爸妈:

大场失守后,东战场再也不能乐观了……日军攻吴兴,芜湖也不成安全之区了,我想或者会搬到安徽,我也希望搬到安徽。

我是为了读书而离爸妈到上海来的,可是到现在读书也不成了,上海的环境也可想而知。我感到自己太无用,不能救国也不能助家,在现在的中国是不容(允)许这样的。

我现立志到陕北……我相信那里能够造就我,报效国家。时间不允许我得到爸妈的允许而行,但我想是不需要的,(爸妈)一定允许我的。我深感长者之爱,但命运不允许我侍奉左右了,我是要远离爸妈了。也许将来还有见面的机会,也许再也没有见面的机会。爸妈不必伤心……我下最大的决心达到目的,尽力打破一切困难。

敬礼
安康
再祝
我们得到最后胜利
传馥
……

1937年淞沪会战后,上海市区和苏南、浙北地区相继沦陷,王传馥所在的学校也被迫从上海搬到浙江。作为一个热血爱国青年,面对“再也不能乐观了”的抗战形势,他“感到自己太无用,不能救国也不能助家,在现在的中国是不容(允)许这样的”。朴实的话语背后,展现了一位有良知的中国人挽救国家危亡、献身抗战事业的民族大义。

到陕北去,是全民族抗战爆发后无数热血青年的人生选择。王传馥就是其中之一。他在信中写道:“相信那里能够造就我,报效国家。”真切的话语,展现了一个热血青年追求光明、追求真理的人生理想。“也许再也没有见面的机会。爸妈不必伤心……我下最

大的决心达到目的,尽力打破一切困难”,表达了他立志救国救民、抗战到底的坚定决心。

直到上海解放后,父母才知道王传馥牺牲的消息,二老痛彻心扉。父亲扶病执笔,记述了儿子的一生。

“回溯往事,凡有血肉,宁不伤心?然求仁得仁,传馥无憾焉。路阻音隔,此八年中家人无不相望。上海解放,正谓相见有日,然事与愿违,竟成永别。伤哉!乃述始末,以志永念。”

1941年年底,父母在长子王传馥投身抗日杳无音信的情况下,不顾时局之艰、战争之危,又坚定地送时年14岁的六子王传洪参加新四军。

这是一封家书,更是一封立志报国的“宣言书”,是王传馥用铮铮铁骨和一腔热血谱写的一曲青春之歌。他的生命尽管短暂,但他的坚定信念永留于天地间。

(摘自《解放军报》文/曾权于童)

钩沉

改革开放后第一张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的百年党史展览,展出了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张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它是1980年12月11日温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的,持有人叫章华妹。营业执照的左下角贴着章华妹的照片。很难想象,照片上这个扎着两个麻花辫,绽放着灿烂笑容的年轻姑娘,竟是改革开放之初第一批“吃螃蟹”的勇敢开拓者。

那时候,温州姑娘章华妹家里很穷,母亲生病,父亲每月30多元的工资要养活一家9口人,日子过得很难。当时工作依靠国家分配,就业机会很少。父母退休后,子女顶替上班的机会给了两个哥哥。1979年,18岁的章华妹依然没有工作。

当时,温州有些人生活所迫,试探着在自家门口摆个摊,卖些生活日用品。章华妹的父亲解放前做过布匹生意,头脑比较灵活,鼓励章华妹也做些小生意。于是章华妹学着别人的样子,把一张小桌子摆放在自家门口,出售一些针线、纽扣、表带、纪念章等小商品,一个月下来能挣20多元。虽然不算多,但以当时的物价,已经够一家人吃饱饭了,这让章华妹很开心。

不过,章华妹的小生意当时属于“投机倒把”,政府有个“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其工作人员经常在街上巡察,抓住章华妹这样的“投机倒把分子”,就会罚款、没收商品。章华妹摆摊时时刻提防,看到他们来了就赶紧收摊关门,等他们走了再出来。

除了曾被取缔的风险,章华妹还要承受社会的歧视。那时在温州也和其他地方一样,人们认为去机关、工厂上班才

是正经工作,做小生意是被人看不起的。章华妹很多朋友、同学知道她摆摊后,不再和她说话,在路上碰见她也不理睬。虽然章华妹心里很难过,但是也没办法,因为家里穷,如果不做小生意就要挨饿了。

有一天,情况有了改变。正在摆摊的章华妹看到一个工作人员朝她走来,正要收摊,却被来人叫住,告诉她,现在国家政策放开了,私人可以做买卖了,她来工商局登记领个营业执照,就可以合法经营了。章华妹想,能合法经营当然好,但是如果以后政策再变了,这个营业执照就不成了“罪证”了?章华妹回家和父母商量。阅历丰富的父亲说,应该抓住这个机会,领取营业执照,合法地做生意。

有了父亲的支持,章华妹第二天就去鼓楼工商所,填写了注册信息,提交了两张照片。过了一段时间,章华妹领到了温州市东城工商局的编号为“东工商证字第10101号”的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营业执照的注册信息是用毛笔填写的:姓名:章华妹;住址:解放北路83号;设立或摆摊地区:同上;生产经营范围:主营小百货;经营方式:零售;开业日期:1979年11月30日。营业执照的左下角贴有章华妹的照片,右下角的发证日期为1980年12月11日,盖有温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的公章。

水上飞机对中国人来说并不陌生,早在99年前,也就是1919年8月9日,中国人研制的第一架水上飞机——“甲型一号”便首飞成功。

作为中国第一架水上飞机,“甲型一号”的诞生来之不易。1903年,美国莱特兄弟首次实现了人类飞翔的梦想。1910年,法国人费勃成功地解决了水上飞机的起降问题,制成世界上第一架水上飞机。虽然当时的中国正处于军阀割据、被列强瓜分的悲惨境地,但中国人没有放弃独立制造飞机的梦想,一批学生远赴国外学习航空技术。这些留学生对中国第一架水上飞机的研制功不可没,其中以巴玉藻和王助最为著名。

巴玉藻和王助,前者被钱学森称为“中国航空之父”,后者被认为是“波音飞机之父”。1916年6月,巴玉藻和王助以优异的成绩获得麻省理

工学院航空工程硕士学位。由于国内政局纷乱,他们毕业后选择留在美国工作,巴玉藻被美国通用飞机制造厂任命为总工程师,王助则成为波音飞机公司的第一任总工程师。至今波音公司在西雅图的博物馆中还有王助的铜匾肖像,并刻有“波音公司第一位工程师”字样。1917年冬,国内局势稍稳,巴玉藻、王助怀揣献身祖国航空事业的志向,毅然启程回国。经北洋政府批准,巴玉藻、王助等人于1918年2月正式在福建马尾船政局内创设我国第一个飞机制造厂——“海军飞机工程处”。他们集中优秀技工进行专业培训;筛选国产材料,测试物理性能;利用船政局原有的机器加工飞机部件。他们在简陋的条件下,终于于1919年8月研制成功中国第一架水上飞机——“甲型一号”。

“甲型一号”是一架单发动机双

浮筒双翼水上教练机,木质机身,高3.88米,机体长9.32米,翼展13.70米,马力100匹,最大时速126千米,空机重量836千克,载重1063千克,飞行高度3.69千米,可航行3小时,航程340千米,乘员2人,可载炸弹4枚,其性能、质量不亚于同时代欧美各国的产品。

然而,闻讯而来的英国人在“海军飞机工程处”参观“甲型一号”后,却不屑一顾。1919年8月9日,福建马尾海岸,在飞机发动机的轰鸣声中,“甲型一号”的螺旋桨飞快转动,紧贴着水面快速滑行,腾空而起!“甲型一号”的起飞,有力回击了英国人的质疑。

(摘自《中国国防报》文/林陈彬 张苗)

老照片



1919年8月,中国人研制成功的第一架水上飞机“甲型一号”模型。

来之不易的中国第一架水上飞机

见证革命情谊的棉背心

在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王若飞纪念馆的展柜中,整齐地叠放着一件蓝色棉背心,这是中共西蒙工委书记乌兰夫的夫人云亭为狱中的王若飞专门缝制的。背心由蓝色粗棉布手工缝制,右襟开襟,领口和腰间各有两道盘扣,里面絮了一层厚实的棉花。

大革命失败后,内蒙古地区的共产党人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中坚持革命斗争。1931年7月底,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和中共中央派返王若飞回国,任中共西北工委特派员。

9月,王若飞冒险来到充满白色恐怖的包头乌兰夫接头。乌兰夫和王若飞早在莫斯科就相识。王若飞此行的任务是开辟包括内蒙古西部在内的西北地区的工作,并在包头建立国际交通总站,以打通共产国际同我国西北地区联系的地下交通线。

王若飞住在商贾云集的一家客栈。考虑到王若飞初来内蒙古,人地两疏,为了保护他的安全,乌兰夫请他到乡下去住。王若飞说这里工作方便,以商人身份作掩护,不会出事。为了配合他的行动,乌兰夫也化装成商人开展工作。

正当乌兰夫按照王若飞布置的任务和要求积极工作时,王若飞被叛徒告密,于1931年10月被捕。乌兰夫等人立即展开了营救工作。王若飞被转押到绥远(今呼和浩特)监狱后,乌兰夫安排人关照王若飞,自己当即赶赴外蒙古,向共产国际驻外蒙古代表报告王若飞被捕和中共西北特委遭到破坏的情况。

乌兰夫从外蒙古回来后,设法将一名叫张有明的地下党员安插进监狱工作,打通了狱内外的联系。根据张有明反映,关押王若飞的牢房阴暗潮湿,人在里面待久了会生病。乌兰夫便让夫人云亭缝了一件厚实的棉背心,想办法托人带给王若飞。在那个艰苦的斗争年代,一件款式简单的棉背心寄托了乌兰夫与王若飞深厚的革命友谊。

王若飞被捕后,坚贞不屈,同国民党当局进行各种斗争。1937年5月,王若飞经中共中央北方局营救出狱。

(摘自《解放军报》文/李静)

大同旧日的香蜡铺

据史料记载,1925年山西大同域内的四大街就已通了电。但因那时发电机容量小、电压低,加上输电线路较长,故电压下降很大,并且电费昂贵,如点一盏16瓦的小灯泡,一个月就要花掉两块大洋。这些钱相当于当时一袋20克白面的价格,那可是两口之家一个月的口粮,所以一般市民用不起,普通市民只能用煤油灯。但最经济实惠的是用蜡烛照明,于是城内仅有的几家蜡制品专营店生意兴隆。

当年坐落於大南街(当时叫永泰街)路西108号的这家万盛明香蜡铺,门面虽然不大,却让人记忆深刻。原因是:店铺双开玻璃门窗上时常张贴着各种各样蜡制品彩色宣传画,不仅古朴素雅,而且新颖奇特;其二,这家店的门口还有一个偌大的蜡制品广告模具,也就是幌子,大红色粗大的蜡烛顶端装点着蜡花造型别致抢眼;再有就是它那花色繁多的蜡制品,以及细致入微的服务项目都让人难忘。

走进这家老香蜡铺,柜台上摆的蜡制品有蜂蜡、白蜡、石蜡和洋蜡,令人眼花缭乱。其中,常用的是蜂蜡和洋蜡。蜂蜡是由蜜蜂腹部腺体分泌出的蜡质(是蜜蜂造蜂巢的材料)生产加工而成的,通称为黄蜡。“万盛明”除销售砖蜡(上述蜡加工成砖形)外,也出售粗细不等的蜡烛,有结婚用的喜蜡,庆寿用的寿蜡,丧事用的丧蜡,以及平时用的小白蜡,还有代表12生肖的生日蜡烛等。那会儿,店铺内最为显眼的是蜡果和蜡像。蜡果是用蜡制成的蔬菜、水果等工艺品;蜡像则是用蜡做成的人物的形象。这些蜡制品是时尚家庭和富户家中柜台上摆的玩物。

在店铺内,有一块专制白蜡的蜡板,和一台蜡床,是供店员为顾客随时加工不同形状和大小白蜡所准备的。在这里,蜡铺还设有画定图案蜡画儿用的各种颜色的蜡笔;为刻印社定制字或刻写用的油印蜡板、蜡纸;为大号字定制涂蜡的专用包裹纸(可以防潮);还为药房、中药铺制作包装丸药的蜡丸。这里的伙计都掌握着一两种本行业技能,掌柜的更是样样皆通,技艺娴熟,只要顾客能说出样子,他就能满足你的要求。

平时,店里的生意是有钱人办丧事和庙上佛像开光等节日需要,往往要红火好几天,用的蜡品种类齐全,数量亦多。这种生意惯例是柜上把准备好的货亲自送到事主门前,并不立即收货款。隔天人家的事主办妥后,伙计才上门结账。余货或残损品尽可包退包换,并给予打折结算。

大约是20世纪40年代末,这家老蜡铺就不存在了。那会儿用蜡的人逐渐少了,而且一般的蜡制品日杂小店都有。但说起当年新颖的服务项目,仍令老大同人难以忘怀。

(摘自《山西晚报》文/刘印军)

体的活动,让章华妹家喻户晓,也给她的经营带来助力。如今,章华妹是温州华妹服装辅料有限公司董事长,年营业额达数百万元,成为一名成功的民营企业企业家。依靠许许多多像章华妹这样敢为人先的民营企业家和政府的引领扶持,温州创造了著名的“温州模式”,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先行地、民营经济重要发祥地,民营经济蓬勃发展,始终走在全国前列。

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民营经济从小到小、从弱到强,不断发展壮大。截至2021年,我国民营企业数量达到4457.5万户,个体工商户更是历史性超过1亿户。民营经济贡献了我

国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要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党的十九大把“两个毫不动摇”写入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作为党和国家一项大政方针进一步确定下来。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我国个体和民营经济必将迎来更大、更辉煌的发展。

(摘自《学习时报》)